

東方

文化集成
季羨林 主编

日本文化编

日本诗歌史

唐月梅 著

やくもたつ いづもやへがき
つまごみに やへがきつく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東方文化集成

季羨林 主編

日本文化編

日本詩歌史

季羨林 主編

唐月梅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诗歌史 / 唐月梅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6
(东方文化集成)

ISBN 978-7-301-25672-5

I. ①日… II. ①唐… III. ①诗歌史—日本 IV. ①I313.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5854 号

- 书 名** 日本诗歌史
著作责任者 唐月梅 著
责任编辑 兰 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672-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31.75 印张 550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 季羨林

名誉总顾问 林祥雄 炎黄国际文化协会会长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研究教授

名誉顾问

杜德桥 英国大学汉语研究所所长、教授
冉云华 加拿大麦克斯特大学教授
饶宗颐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谭中 印度尼赫鲁大学院汉语系主任、教授
池田大作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 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王庚武 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前香港大学校长
马悦然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教授 诺贝尔奖瑞典文化学院评审委员会委员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哈佛燕京学社前主任 北京大学研究教授
安乐哲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罗亚娜 斯洛文尼亚卢布亚纳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欧洲中国哲学研究会会长

特别顾问 陈嘉厚 张殿英

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镛 叶奕良 卢蔚秋 刘 烜 孙承熙 仲跻昆 李中华 李 谋
吴同瑞 张广达 张岂之 张光璘 姚秉彦 赵常庆 梁立基 袁行霁
麻子英 黄宝生 楼宇烈

主 编 张玉安 唐孟生 严绍盪 王邦维

《东方文化集成》分编主编

东方文化综合研究编

孟昭毅 郁龙余 侯传文

中华文化编

张 帆

日本文化编

严绍盪 王新生

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编

李先汉 金景一 陈岗龙

东南亚文化编

裴晓睿 罗杰

南亚文化编

薛克翘 魏丽明

伊朗、阿富汗文化编

王一丹 张敏

西亚北非文化编

赵国忠 吴冰冰 林丰民

中亚文化编

吴宏伟

古代东方文化编

拱玉书 李政

编辑部成员

主任 唐孟生

副主任 李政 林丰民 魏丽明

秘书 樊津芳

“东方文化集成”总序

季 羨 林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所谓“世纪”和“世纪末”，本来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非若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秩序井然，不可更易，而且每岁皆然，决不失信。“世纪”则不同，没有耶稣，何来“世纪”？没有“世纪”，何来“世纪末”？道理极明白易懂。然而一旦创造了出来，它就产生了影响，就有了威力。上一个“世纪末”，19世纪的“世纪末”，在西方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就出现过许多怪异现象，甚至有了“世纪末病”这样的名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待辩论与争论。

当前这一个“世纪末”怎样呢？

我看也不例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政治方面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不平静。文化或文明的辩论或争论就很突出。平常时候，人们非不关心文化问题，只是时机似乎没到，争论不算激烈。而今一到世纪之末，人们非常敏感起来，似乎是憬然醒悟，于是东西各国的文人学士讨论文化的兴趣突然浓烈起来，写的文章和开的会议突然多了起来。许多不同的意见，如悬河泄水，滔滔不绝，五光十色，纷然杂陈。这样就形成了所谓“文化热”。

在这一股难以抗御的“文化热”中，我以孤陋寡闻的“野狐”之身，虽无意随喜，却实已被卷入其中。我是一个有话不说辄如骨鲠在喉的人，在许多会议上，在许多文章中，大放厥词，多次谈到我对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以及东方文化在未来的新世纪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等等的看法。颇引起了一些不同的反响。

为说明问题计，现无妨把我个人对文化和与文化有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简要加以阐述。我认为，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其为贡献则一也。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成的。使用一个文绉绉的术语，就是“文化多元主义”。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是法西斯分子的话，为我们所不能取。

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决不独占山头，进行割据，从而称王称霸，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人类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随时进步，对大自然，对社会，对自己内心认识得越来越深入细致，为自己谋的福利越来越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

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并没有创造出第三个大文化体系。

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其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既然同为文化，当然有其共同点，兹不具论。其不同之处则亦颇显著。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认为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倘若仔细推究，这种差异在在有所表现，不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还是在理工学科中。我这个观点曾招致不少的争论。赞成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想同我商榷者有之，持保留意见者亦有之。我总觉得，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东西方文化了解研究得都还不够深透，有的人连我的想法了解得也还不够全面，不够实事求是，却唯争论是尚，所以我一概置之不答。

有人也许认为，我和我们这种对文化和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是当代或近代的产物。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这种看法。实则不然。法国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所著《丝绸之路》这一部巨著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论述，大多数为我们所不知。我在这里不详细介绍。我只引几段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论述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话：

由扎希兹转载的一种萨珊王朝（226—Ca. 640年）的说法是：“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们未传授过任何艺术。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的工艺，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科学理论。”（329页）

羡林按：最后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中国也是有理论的。这就等于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完全是隔膜的外行话。书中还说：

在萨珊王朝之后，费尔多西、赛利比和比鲁尼等人人都把丝绸织物、钢、砂浆、泥浆的发现一股脑儿地归于耶摩和耶摩赛德。但我们对于丝织

物和钢刀的中国起源论坚信不疑。对于诸如泥浆——水泥等其余问题，它们有99%的可能性也是起源于中国。我们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安息——萨珊——阿拉伯——土库曼语中一句话的重大意义：“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约萨法·巴尔巴罗于1471年和1474年在波斯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同时还听说过这样一句学问深奥的表达形式：“希腊人仅懂得理论，唯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376页)

关于一只眼睛和两只眼睛的说法，我还要补充一点：其他人同样也介绍了另外一种说法，它无疑是起源于摩尼教：

“除了以他们的两只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329页)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引这许多话，绝不是因为外国人夸中国人有两只眼睛而沾沾自喜，睥睨一切。令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样漫长的时间以前，在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今天不能不佩服他们观察的细致与深刻，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除了说中国没有理论我不能同意之外，别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在当时的世界上，确实只是中国和希腊有显著、突出、辉煌的文化。现在中国那一小撮言必称希腊的学者们或什么“者们”，可以憬然醒悟了。

但是这也还不是令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最浓烈的兴奋点在于，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畅谈东西文化之分，极富于近现代的摩登色彩。波斯和阿拉伯传说都证明：东西文化之分的说法，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其次，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文化的东西二分法，我并非始作俑者，古代的“老外”已先我言之矣。令我更感到欣慰的是我讲的东西方思维方式是东西文化的基础。波斯和阿拉伯古代的说法，我认为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分析出理论，综合出技术，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时至今日，古希腊连那一只眼睛也早已闭上，欧洲国家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辉煌的文化，使欧洲文化光照寰宇。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也跟了上来，普天之下，莫非欧风。欧美人昏昏然陶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以“天之骄子”自命，好像有了两三只眼睛。但他们完全忘记了历史，忽视了当前的危机。而中国呢，则在长时期内，由于内因和外因的缘故，似乎把两只眼睛都已闭上。古代灿烂文化不绝如缕。初则骄横自大，如清初诸帝那样，继则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同样昏昏然拜倒在西方的什么裙下，一直到了今天，微有苏醒之意，正在奋发图强中。

从上面谈到的历史事实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上下五千年，纵横

十万里，东西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本来是两句老生常谈，是老百姓的话，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提出来说明东西文化的关系，国内外都有赞成者，国内外也有反对者，甚至激烈反对者。我窃以为这两句话只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古代哲学讲变易，佛家讲无常，连辩证法也讲事物时时都在变化中。大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内心，无不证明这两句话的正确。我不过捡来利用而已。《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不也就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吗？

可是东西方都有人昧于这个浅显的道理。特别是在西方，颇有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觉得自己的辉煌文化会万岁千秋地辉煌下去的。中国追随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文化也像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不会永驻的，也是有一个诞生、发展、成长、衰竭、消逝的过程的。

但是，中国有一句俗话：是非自在人心。人是能够辨是非，明事理的。以自己的文化自傲的西方人也不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这种人简直如凤毛麟角。一战爆发，惊醒了某一些有识之士。事实上在一战爆发前，就有人有了预感。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1911年就预感到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后来大战果然爆发。从1917年起，斯宾格勒就开始写《西方的没落》。书一出版，立即洛阳纸贵。他的基本想法是：文化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青春，二、生长，三、成熟，四、衰败。尽管他的推论方法，收集资料，还难免有主观唯心的色彩。但是，他毕竟有这一份勇气，有这一份睿智，敢预言当时如日中天的，他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八个文化中唯一还有活力的文化也会“没落”。我们不能不对他表示敬意。美中不足的是，他还没有认识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存在和交流关系。(参阅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

在西方，继斯宾格勒而起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他自称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二人同样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是他们有先见卓识之处。汤因比继承了斯宾格勒的意见，认为文化——他称之为“文明”——都有生长一直到灭亡的过程。他把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分为21种，有时又分为26种。这些意见都表述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1934—1961年)，共12卷。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是引入东方文化的讨论。到了70年代，他同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对话时，更进一步加以发挥，寄希望于东方文化。(参阅《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我并不认为，斯宾格尔和汤因比——继他们之后欧美一些国家还有一批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赞成他们的意见，我在这里不具引——等的看法都百分之百正确。但在举世昏昏，特别是欧美人昏昏的情况下，唯独他们闪耀出一点灵光，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的看法从大体上来看，我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借用上面提到的古代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说法，我就想说：希腊人及其后代的那一只眼睛，后来逐渐变成了两只眼睛；可物极必反，现在快要闭上了。中国人的两只眼睛，闭上了一阵，现在又要睁开了。

闭上眼睛的欧美人士，绝大多数一点也不了解东方，而且压根儿也没有了解的愿望。我最近多次听人说到，西方至今还有人认为中国人还缠小脚，拖辫子，抽大烟，养小老婆。甚至连文人学士还有不知道鲁迅为何许人者。在这样地球越变越小，信息爆炸的时代，西方之“文明人”竟还如此昏聩，真不能不令人大为惊异。反观我们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欧美的一切，我们几乎都加以崇拜。汉堡包、肯德基、比萨饼，甚至莫须有的加州牛肉面，只要加一个洋字，立即产生大魅力，群众趋之若鹜。连起名字，有的都带有点洋味。个人名字与店铺名字，莫不皆然。至于化妆品，外国进口的本来就多。中国自造的也多冠以洋名，以广招徕。爱国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谴责这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和行为。然而，从一分为二的观点上来看，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专就东西而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对西方几乎是了若指掌，而西方对东方则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是一团漆黑。将来一旦有事，哪一方面占有利条件和地位，昭如日月矣。

对西方的文化，鲁迅先生曾主张“拿来主义”。这个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过去我们拿来，今天我们仍然拿来，只要拿得不过头，不把西方文化的糟粕和垃圾一并拿来，就是好事，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利。但是，根据我上面讲的情况，我觉得，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决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不管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总是要送的。《诗经·大雅》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西方文化给人类带来了一些好处。我们中国人，我们东方人，是懂得感恩图报的民族。我们决不会白吃白拿。

那么，报些什么东西呢？送去些什么东西呢？送去的一定是我们东方文化中的精华。送去要有针对性，针对的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个西方文化产生的“危机”。光说“危机”，过于抽象。具体地说，应该说是

“弊端”。近几百年以来，西方文化产生的弊端颇多，举其大者，如环境污染、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破坏、物种灭绝、人口爆炸、新疾病丛生、淡水资源匮乏等等。此等弊端，如不纠正，则人类前途岌岌可危。弊端产生的根源，与西方文化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有紧密联系。西方对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大自然分析不息，穷追不息，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天何言哉！”然而“天”——大自然却是能惩罚的，惩罚的结果就产生了上述诸种弊端。

拯救之方，我认为是有，这就是“改弦更张”“改恶向善”，而这一点只有东方文化能做到。东方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天人合一”，张载的《西铭》是一篇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最精辟的文章：“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下略）印度哲学中的“梵我一如”，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总之，东方文化主张人与大自然是朋友，不是敌人，不能讲什么“征服”。只有在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条件下，才能伸手向大自然索取人类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也只有这样，人类的前途才有保障。

我们要送给西方的就是这种我们文化中的精华。这就是我们“送去主义”的重要内容。

我们的“李”送了出去，接受不接受呢？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正式地送，大规模地送。连我们东方人自己，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人，还不知道，还不承认自己的这种宝贝，我们盲目追随西方，也同样向自然界开过战，我们也同样有那一些弊端，立即要求西方接受，不也太过分了吗？不过，倘若稍稍留意，人们就会发现，现在世界各国，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也不管是根据什么哲学，注意到上述弊端而又力求改变的人越来越多了。今年《日本经济新闻》刊载了高木韧生的文章，说21世纪科研重点将是“人类生存战略”。这的确是见道之言。我体会，这里所说的“科研”包括文理两个方面。作者把科研提高到“人类生存”这个高度来看，不能不谓之为有先见之明，应该受到我们大家的最高的赞扬。至于惊呼人口爆炸的文章，慨叹新疾病产生的议论，让人警惕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的破坏、淡水资源的匮乏等等的号召，几乎天天可见。人类变得聪明起来了，人类前途不是漆黑一片了。我想，世界各国每一个有心人，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我这一个望九之年的耄耋老人，也为之手舞足蹈了。

我在上面刺刺不休说了那么多话，画龙点睛，不出一点：我曾在一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过一篇短话，题目叫做“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

人类”。我在上面说的千言万语，其核心就是这一句短短的话。至于已经来到我们门前的 21 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西方文化究竟如何演变？东方文化究竟能起什么具体的不是空洞的作用？人类的前途究竟何去何从？所有这一切问题，都有待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加以证明。从前我读过一个近视眼猜匾的笑话。现在新的一个世纪还没有来临，匾还没有挂出来，上面有什么字，我们还不能知道。不管自诩眼睛多么好，看得多么远，在这一块尚未挂出来的匾前，我们都是近视眼。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就是了解。我们责怪西方不了解东方文化，不了解东方，不了解中国，难道我们自己就了解吗？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并不全了解中国，并不全了解东方，并不全了解东方文化。实在说，这是一出无声的悲剧。

了解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而学习首先必须有资料。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学习资料首先是文字，也就是书籍。环顾当今世界，在“欧洲中心论”还有市场的情况下，在西方某一些人还昏昏然没有睁开眼睛的时候，有关东方的书籍，极少极少。有之，亦多有偏见，不能客观。西方如此，东方也不例外。即使我们有学习的愿望，也是欲学无书。当然，东方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各国刊出书籍的多寡也不尽相同。但总之是很少的。有的小一点的国家，简直形同空白。有个别东方国家几乎毫无人知，它们的存在在一团迷雾中，若明若暗，似有似无。这也是一出无声的悲剧。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这一批人不自量力——或者更明确地说是认真“量”过了自己的“力”，倡议编纂这一套巨大空前的《东方文化集成》。虽然，我们目前的队伍，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还不是太大；我们的基础还不是太雄厚；但是，我们相信主观能动性。我们想“挽狂澜于既倒”，我们决非徒托空言。世界人民、东方人民、中国人民的需要，是我们的动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是我们的愿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越来越变得聪明，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老、中、青三结合，而对著作的要求则是高水平的。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活动，既提高了中国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水平，又能培养出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收得一举两得之效。

我们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我们反对民族歧视；但我们也并不张扬“东方中心主义”。如果说到或者想到，在 21 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的话，那也是出于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观察与预见，并不出于什么“主

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对东方几十个国家一视同仁。国家不论大小，人口不论多寡，历史不论久暂，地位不论轻重，我们都平等对待，决不抬高与贬低，拜倒与歧视。每一个东方国家都在我们丛书中占有地位。但国家毕竟不同，资料毕竟多寡悬殊。我们也无法强求统一。有的国家占的篇幅多一点，有的少一点。这是实事求是，与歧视毫无关联。我们虔诚希望，在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中，中国的两只眼睛都能睁开，而且睁得大大的，明亮而睿智。西方的一只眼睛能变成两只，也同样睁开，而且睁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世界上各个民族也都有了两只眼睛，都要睁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我们共同学习，努力互相了解。我们坚决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步，人类会越来越能相互了解，世界和平越来越成为可能，人类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不管还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人类有朝一日总会共同进入太平盛世，共同进入大同之域。

1996 年 3 月 20 日

一片诗心铸诗史(代序)

——唐月梅先生《日本诗歌史》学习札记

记不清最初读到唐月梅先生的文字是在什么时候,但印象鲜明地记住唐先生的名字,则肯定是在读到她翻译的川端康成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辞之后。那时我刚刚读过川端的名作《雪国》,很为小说中诗意的句子和描写所打动,但让我反复翻读而仍流连不已的,却是这篇《我在美丽的日本》。也许因为自己已经开始写一些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文字,自然就更为感佩川端先生能把谈文论艺的文章写得如此诗情盎然。不过,实话实说,当时我虽然记住了译者,却没有怎么考虑译者的存在,甚至没有觉得自己是在通过译文阅读川端,仿佛阅读“中文的川端”是很自然的,并没有生疏和异样的感觉。若干年后,当我也学习做一点文学翻译,对照日文原文重新阅读唐先生的译文,才渐渐体会到,为了把川端深潜于幽雅日文表现里的诗意转换为同样具有诗意的中文,她曾付出了怎样的心力。

在我看来,唐先生对川端文章的诗意把握和转换,主要着眼于内在的节奏、语调和意境,她当然也注意词句的推敲和锤炼,比如把川端演说辞的标题“美しい日本の私”译作“我在美丽的日本”,把演说辞里引录的道元、明惠等禅师充满玄思奥义的三十一音节和歌译为中国旧诗句调的七言两行,无疑都费了很多心思。但唐先生似乎无意追求造句的标新立异,也无意追求译文的陌生化效果,而更在意合乎汉语表达的规范,她的翻译基本以忠实原作的“直译”为原则,不刻意藻饰,更不做过度渲染,却能够在中规中矩且很有节制的汉语表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诗一般的优雅韵味。这不限于她的川端翻译,在她翻译的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里,我也读到了同样的笔致。

唐先生译作很多,仅就她翻译过的日本现当代作家也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她对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有一种特别的喜爱。这虽然不见诸她的公开谈论,但分明体现在她的翻译文字里。翻译家为原作者代言,同时也通过译文表现自己,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唐先生的译笔一旦接触到川端或东山,便显得格外舒展,便见出别样的精神,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诗心的契合吧。

唐先生其实是很有诗人气质的,尽管她给人的印象,更多是温文的翻译家和知性的研究者。据我的有限了解,她人生历程的几次大转折:从

1950年代初告别世代侨居的湄公河畔，毅然返回新中国求学，到1970年代末从中央对外文化交流机关转到学术研究机构，在将近知天命之年，决然以日本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为志业，再到退休后潜居书斋，和叶渭渠先生一起悄然开始新的学术人生，埋头译著二十余年，每一次选择，都不是出自理性的功利考量，而是她内心里超越了功利的理想和激情使然，而这理想和激情，不正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情怀吗？秉持如此纯粹的诗心，加之对诗意文字的特殊热爱和特别的敏感，唐先生把《日本诗歌史》作为自己晚年的重要工作，可谓是情之所至，理所当然；而在最近几年，她承受巨大的心灵创痛和身体疾痛，仍写作不辍，终于奋力完成了这部厚重的著作，更可以说是为了诗“九死而不悔”了。

唐著《日本诗歌史》体大而思深。体大，首先表现在其囊括的内容，从上古的原始歌谣、咒语、祝词，到二战以后的诗坛与诗作，唐著宏观勾勒了有文字记录的日本诗歌的历史轮廓，且对其中的重要思潮、代表性诗人和作品悉数论及，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通史。体大，还表现在唐著的整体史观。唐先生写诗歌史，显然不满足于简单地罗列诗歌现象或排列诗人名单，而是把日本诗歌视为一个有自身发展、演进路程的有机整体，努力在追溯其历史轨迹的过程中，发现其艺术表现的特质，思考其嬗变的规律及导致其变化的各种因素。而这，也是唐著“思深”的表现。

唐著的“思深”，还表现在对日本诗歌史的开放性的认识和描述上。唐先生认为，日本诗歌的历史，不是纯粹自发的由古而今的变迁史，而是以本土文化思想为根基，不断吸收、消化外来诗歌和诗学营养而最后达成日本化的历史，是和汉、和洋诗歌由冲突而并存，最终实现了融合的历史。在很长的时间内，强调日本诗歌的“民族”传统，重“和”而轻“汉”，甚至把“和歌”叙述为日本诗歌的惟一正统谱系，曾经成为有关日本古代诗歌史的主导叙述，比较而论，唐先生的“融合说”显然比此类叙述更具开放性，也更符合历史实际。而唐著在关注外来影响的同时，并没有夸大“影响”的作用，唐先生明确说，她不认为“影响”会起决定性作用，她的关注重心更在于外来影响和本土传统经过冲突和融汇之后所引发的诗歌表现、类型乃至诗学理念的变化。在这方面，唐先生明显表现出了文学史家的理性和冷静。

整体性的历史观，是支撑唐著《日本诗歌史》这座宏大建筑的坚固基石，应该也是激励唐先生独立完成这部著作的重要动力。但唐著同时也对这座建筑里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精细雕刻，对每一个时期的重要诗歌现象、诗人和诗作，皆做扎实的个案研究，既细致解读具有代表性诗作的

文本,又考察诗人的人生经历和所处的社会境遇,知人论世,将之放在诗歌史上综合评价,这样的写法,可谓有树有林,整体格局气象宏大,局部肌理丰盈饱满,两相映衬,从而筑成了一部内涵厚重的诗史。而由于唐先生以“融合说”观察诗史,于古代部分“和汉”并重,不仅把日本诗人写作的“汉诗”作为一条重要脉络纳入诗史范围,且敏锐体察“和歌”里的“汉诗”因素,再进而发挥中国学者的知识特长,予以细致的考辨、分析和品鉴,从而在积累厚重的先行研究基础上有理有据地提出了新见,为此部著作增添了特别的色彩。

最后还需指出,作为一部用中文写成的《日本诗歌史》,著者必须做的一项工作,是把日文的诗作和诗论翻译为中文。这对于日本本国的学者来说本是无须考虑的,但对于中文著者,却是无法回避且必须去试炼的课题,其艰巨程度,并不亚于甚至超过诗史的描述和评析。唐著囊括日本从古至今的各类诗型、诗体以及各种风格和流派,唐先生尝试以多样诗式对应,或译为中国旧诗体式,或以口语自由体表现,目的皆在既传达日文原作的韵致,又具备中文诗歌的风神,而这种跨语言探索的艰辛,常常隐而不显,须用心品味才可察知。当然,唐先生的译诗虽不乏佳句,但如同诗无达诂,诗亦无达译,依唐先生一贯的谦和性格,她自己肯定认为翻译无止境,译诗更是一项永存遗憾的工作,不过,她仍然锲而不舍,在《日本诗歌史》里,把很多迄今尚无中译的作品译为中文,这种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努力,无疑是值得深深尊敬的。

作为后学,我很早就阅读唐月梅和叶渭渠先生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后来以比较文学研究为业,关心范围在中国和日本的近现代文学之间,有时做一点翻译,结识了几位同道,自然就更多了直接向唐、叶两位先生请教的机会。尤其是在两位先生刚刚退休并开始新的著译工作的那几年,他们位于一座简陋宿舍楼六层的住所,也就是叶先生常在书前文末自署“寒士斋”的狭小客厅,常常成为我们去叨扰聚谈的地方。落座之后,叶先生会给每人沏上一杯香浓的咖啡或浓郁的红茶,然后搬来他们新近出版的译作或著作,一一签名留念,而唐先生则在一旁静默地微笑。但现在,叶先生爽朗开怀的笑声,唐先生温文静谥的笑容,寒士斋里茶香伴书香的温馨情景,都成了远去的记忆。2010年12月11日晚叶先生在北京遽归道山,唐先生随后便和子女远赴美国。后来通过友人听说一点消息,知道唐先生承受巨大的精神创痛和自身的疾痛,仍勉力翻译和叶先生合译的《源氏物语》未完部分,并继续写作《日本诗歌史》,内心只有感佩和默默的祈愿。再后来,唐先生邮件传来《日本诗歌史》文稿,并嘱写序言,令我既

不敢辞，又惶恐不敢应，踟蹰推延，居然一年有余，两月前叶建兄回国出差，专门约我见面，赠送作家出版社印行的叶、唐两先生合译《源氏物语》三册，使我知道，尽管无论学识还是资历，我都不能担当为唐先生著作写序的重任，但此事却无论如何不可再拖，遂写成以上札记式的文字，算作初步学习唐先生著作的心得，也作为今后继续学习的开端。

王中忱

2014年7月28日，写于北京清华园